

一緘書簡藏何事： 論戰後龍瑛宗的生活日常與文壇復出

王惠珍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中文摘要

本文利用劉文甫先生近期捐贈之龍瑛宗的家書、收藏之書信、隨筆文本等，以實證的方法，藉此釐清龍瑛宗在輟筆三十年後，除了他個人主觀的書寫欲望之外，探討他復出文壇的客觀條件。本文首先將整理書信內容，一窺作家晚年的生活日常，和家書中流露出的文學感性。接著，將利用戰後龍瑛宗與文友間的書信往來資料，探討他在七〇年代末至八〇年代，與台灣日語世代的互動情況及其重建的人際網絡。在日語小說發表受挫後，他重新計畫性積極以中文寫作，以「前輩作家」、「客籍作家」的身分，接受當時報刊副刊主編等的邀稿，復出文壇開創他戰後另一個創作高峰。

關鍵詞：龍瑛宗、書簡、生活日常、語言、復出

**The hidden meaning of the letters:
Long Ying-Zong's daily life
and had a comeback after War World II**

Wang, Hui-chen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Long Ying-Zong 's family letters, collections of letters, essays, etc., which are from the donation of Mr. Liu Wen-Fu. This paper uses positivist research methods to clarify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for his return to the literary world, in addition to his personal subjective writing desires, after he stopped writing for thirty years. First of all, sort out the contents of the letters, we can see the daily life of the writer in his later years, and the literary sensibility revealed in the family letters. Then, using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Long Ying-Zong and his literary friends,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aiwanese language and Japanese language generation and the 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he rebuilt in the late 1970's to 1980's. After frustration in the publication of a novel written in Japanese, he re-planned and actively wrote in Chinese. As a “predecessor writer” and “Hakka writer”, he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to submit a manuscript from the editor of a newspaper supplement,

and returned to the literary world to create another creative peak after the War World II.

Key words: Long Ying-Zong, the letters, daily life, language, comeback

一緘書簡藏何事： 論戰後龍瑛宗的生活日常 與文壇復出

一、前言

龍瑛宗（1911-1999）1937年以處女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榮獲第九屆《改造》懸賞創作獎後，隨即在戰火煙硝中展開他的文學活動。戰前他的創作活動飽受戰爭動員和檢閱制度的制約；戰後他卻又因語言、政治等因素噤若寒蟬遠離文壇。戰前他為了追求文學夢想，1941年辭去令人稱羨的台灣銀行工作，從東部花蓮港廳返回台北城，進入報界從事記者、編輯等工作；戰後初期從殖民統治的枷鎖中解放出來，堅守文學陣營編輯《中華》、《中華日報》日文版、《山光旬刊》等媒體刊物，撰寫大量的文學評論等。但，最後仍因戰後台灣政經社會動盪不安，使他不得不屈就於現實生活，重返銀行界從低階的銀行員做起。六〇年代初雖曾應邀參加編輯國民黨政府對日宣傳刊物《今日之中國》的工作，原本計畫赴日擔任刊物主編，但最後卻無功而返。直到1976年退休前後才重拾文筆，積極參與公開的文藝座談活動的邀請重返文壇。

龍瑛宗的文學活動大致可以分成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戰爭期，自1937年至1945年。第二個階段是戰後初期，自1945年至1949年。第三個階段戰後1950年至1976年合作金庫退休。第四個階段是1976年退休至1999年逝世。

許維育在《戰後龍瑛宗及其文學研究》¹中，針對龍瑛宗戰後的文學活動進行初步整理，勾勒出他與戰後國內文壇的互動關係，同時，析論龍瑛宗長篇《紅塵》、〈杜甫在長安〉等作品及其創作活動，為戰後龍瑛宗文學研究奠定重要的研究基礎。有關龍瑛宗戰後的私領域的生活，除了子嗣劉文甫與劉知甫曾撰文記述之外²，2015年承蒙龍瑛宗長子劉文甫先生慨捐自1974至1986年共計50件贈與國內大學圖書館館藏，讓我們有機會一窺這一個階段龍瑛宗的生活日常與親友的互動關係，這批書信是我們理解龍瑛宗第四階段文學活動很重要的一手史料³。

因此，本文將利用這批書信、參照戰後留存的書信⁴、隨筆文本等，以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交錯對照閱讀希望藉此釐清龍瑛宗在輟筆三十年後，除了他個人主觀的書寫欲望之外，其復出文壇的客觀條件為何？在戰後文壇中他的復出活動本身具有怎樣的文化歷史意涵？本文首先將整理書信內容，一窺作家晚年的生活日常，和家書中流露出的文學感性。接著，將利用戰後龍瑛宗與文友間的書信往來的資料，探討七〇年代末至八〇年代之間，他與台灣日語世代的互動情況，釐清他如何重建與戰前在台日本友人的人際網絡？日語小說發表受挫後，他又如何重新以中文寫作，接受當時國內報章媒體的邀稿，開創他個人戰後創作的另一個高峰？

二、作家晚年的生活日常

龍瑛宗1976年退休後，蟄居在家含飴弄孫，和妻子李耐在家偕同照顧孫輩成為他的生活重心。他是一位生活起居極其規律的人，戰前寄給父親劉源興的

¹ 許維育，《戰後龍瑛宗及其文學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8年）。

² 例如：劉文甫的〈我回憶中的父親〉和劉知甫的〈幻想與讀書 悼念父親龍瑛宗——生命中的兩大支柱〉，《龍瑛宗全集》第8冊（台南：國家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頁279-316。

³ 這50件書信中有35件典藏在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其它的信件藏於劉文甫先生的母校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在《龍瑛宗全集》第8冊中只收錄了劉榮宗給劉文甫的書信四則，其中第四則的原件，收入在清大圖書館，其它的三件收於政大圖書館。這些書信皆以日文寫成，本論文的引文皆由張雅萍譯出，筆者再行校譯。目前館藏於清大的藏件已全數譯出，感謝清大圖書館提供翻譯補助經費補助，謹此誌謝。

⁴ 《龍瑛宗全集》資料蒐集的階段，許維育曾整理一批龍瑛宗書信資料，可參閱同註1，〈附錄三：龍瑛宗收受信函簡目初編〉，頁214-223。

家書中，就曾提及他為了避免氣喘發作認真規律運動，藉以安父母之心。退休之後生活一如往昔，同樣規律地在傍晚時分外出散步、購買郵資寄信給旅日的長子和親友們。

（一）生活點滴與思子之情

如同一般私領域的家書，書簡中內容多記錄家庭生活瑣事，其中最常提及的，不外乎是同住的二子知甫和女兒淑惠等家中成員的生活狀況，和孫輩的成長點滴。退休隔年適值知甫的長子仲岱出生，祖孫兩人經常相偕在家，信中提及孫子的彌月聚餐、九個月大時的模樣，其中的一則還寫到：「仲岱十三個月大，他正搖搖晃晃地走過來，先就此擱筆。」（1976年2月27日），在家書中記錄著他的生活場景。

龍瑛宗總是在薄薄的航空信紙中，夾送著家人的照片和滿滿的平安問候。另外，1970年劉文甫經戴國輝（1931-2001）的介紹，進入亞細亞經濟研究所工作。他也因此在台灣特地為文甫訂閱《聯合報》海外版和《データ・ブック》，或剪報等寄送至日本，為他提供即時的經濟資訊和國內的相關財經政策。文甫的日本友人，出差路經台北時，龍瑛宗亦會善盡地主之誼接待友朋，並在信中回報。

年節時他也會特地寄送肉脯和年糕等家鄉味給文甫，甚至還教導他如何處理發霉的年糕，信中時常流露出他的文學感性和關愛之情。例如信中寫到：「昨天晚上，元旦的夜晚早早沉寂，死沉地進入湖底般恢復了寧靜，母親說，這讓她想起武藏野的夜晚。（？年2月16日）」，思念之情溢於言表。

（二）親友往來和北埔記憶

龍瑛宗出身北埔，戰前的小說〈黃家〉、〈獏〉等多篇作品皆以故鄉為小說舞台。北埔的地處台灣北部隘勇線之上，清領時期因為漢族墾拓經常出現原漢衝突，日治時期1907年又曾發生過大規模的北埔抗日事件，是一個充滿族群衝突的歷史空間。北埔客庄保有客族「晴耕雨讀」的傳統文風人才輩出，其中，

曾擔任過新竹縣縣長（1960-1968）彭瑞鷺，是龍瑛宗北埔公學校時期的同學。彭應屆順利考上台北師範學校，他卻落榜只好留在北埔就讀高等科，彭返鄉時從台北特別帶回當時流行作家吉田絃二郎（1886-1956）的散文集與他分享閱讀，這樣美好的閱讀經驗成為兩人晚年相聚閒談的年少回憶⁵。

1927年他自北埔公學校畢業後便離鄉北上求學，除了戰爭末期因避難疏開，攜家帶眷暫寄居在北埔親戚家之外，幾乎長期旅居在外。但，家族親友仍聚居北埔小鎮，每逢清明掃墓、同學會、婚喪節慶等他仍會歸鄉團聚，因此，在家書中偶爾也會報告家族親友往來的情況與消息。在書信中他提到：

她（旭初的母親⁶，當時 79 歲）也說到祖父年輕時的故事，從她的話裡可以窺見當初祖父開拓治安惡劣的蠻荒之地時的歷史斷片。祖父在年輕的時候曾經營提煉樟腦的腦寮，但因風險頗高之故便終止。「但，我卻對明治二、三十年代的故鄉風物開始感興趣。」這些事蹟最後會無人知曉，將永遠消逝在人們的記憶中吧。如果可以，我想要把這些事情寫下來。（1974年12月17日）

與北埔親友的雜談，日後都成為龍瑛宗書寫故鄉和家族拓墾歷史的靈感來源，故鄉北埔成為他晚年家族史書寫的重要舞台。每當返回故里探訪親友時，在信中也會抒發自己步入老境的孤寂感：

19日是假日，我們早上5點搭少克的計程車⁷，和母親、知甫、抒芳、抒苑一同前往北埔掃墓。住在新竹的三姑也來了。回程中，我們去竹東探望生病的榮恭叔，他已高齡近80歲。我們要離開的時候，他眼泛淚光。或許時日不多了。大家也要保重身體。（1977年3月27日，底線為筆者所加）

⁵ 龍瑛宗，〈與舊友話當年〉，《龍瑛宗全集·隨筆集（2）》（台南：國家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頁364-367。

⁶ 黃旭初是龍瑛宗大姊劉義妹的兒子。感謝劉文甫先生提供〈龍瑛宗手紙に登場する人文〉一文，協助筆者釐清書信人物關係，謹此誌謝。

⁷ 劉少克是二哥劉榮殿的兒子。

榮泰叔在上個月去世了，享壽 79 歲。他家在五指山附近的深山裡，我與少桓一同出席他的喪事⁸。在陡坡山道走了一個小時以上的路，感覺被打敗了。而「榮」字輩兄弟大家都到西方去了，只留下我一個人在世。

(1977 年 5 月 5 日，底線為筆者所加)

親友一別難再見的淚眼和走在陡坡上的氣喘吁吁的身影，讀來令人如見其景人物躍然紙上。

1987 年解嚴前後客家運動與其他社會民主運動一樣風起雲湧蓬勃發展，其中鍾肇政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⁹。他也多次以「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的信箋寫信與龍瑛宗聯絡，希望他同意將他的作品收入《客家文學選》中。同時這段期間，他亦以「客籍作家」的身分接受《客家》雜誌邀稿，在書寫的過程中客庄的童年記憶、北埔的歷史古蹟、客家祭典等記憶不斷地被召喚，故鄉書寫因而成為他戰後文學書寫的主題之一。

(三) 戰後日本友人的書信往返

龍瑛宗除了勤於寫信更細心保管文友寄來的信札，除了台籍文友之外，亦收藏不少日本友人的信件。在這批家書中有三封信重複提及日本友人池田敏雄(1916-1981)。池田在戰後曾於《台灣近代現代史研究》第 3 號發表〈《文藝台灣》のほる苦さ—龍瑛宗氏のことなど〉介紹龍瑛宗，同號中也刊出龍瑛宗的〈《文藝台灣》と《台灣文藝》〉一文。根據池田的明信片¹⁰，這篇作品應是他受池田之邀所寫成的回憶文，刊出後池田也在書簡中抒發閱讀感想：

玉稿〈《文藝台灣》和《台灣文藝》〉於十三日刊出，十五日收到您的來信。是篇很好的稿件，其中如不為人知的津唐會談¹¹的插曲等，學兄的

⁸ 劉少桓是二哥劉榮殿的兒子。

⁹ 張維安，〈鍾肇政與客家運動：從新的客家人談起〉，收於彭瑞金主編，《鍾肇政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前衛，2018 年)，頁 439-445。

¹⁰ 池田敏雄致劉榮宗書簡，日期註記：1980 年。

¹¹ 「唐津會談」一詞出自於龍瑛宗的〈《文藝台灣》と《台灣文藝》〉一文。根據龍瑛宗的回憶，「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時，張氏和我都是台灣地區的代表。當船駛離基隆港時，是很

立場又若無其事地講出，我想這是相當珍貴的回憶。特別是張氏的偏見，例如藤野氏所言不像是作家會說的話，而你又能理解張氏，實屬難得。¹²

又，根據池田的 1980 年賀年卡，可知龍瑛宗亦曾委託他《紅塵》的出版之事，卻未能如願出版¹³，但池田卻仍撰文介紹。

另外致上介紹學兄〈紅塵〉的拙文的抽印本。這也應該收入復刻本中，卻沒寄送。我為避免忘記而寄送。最近那邊的作家、評論家對於西川滿氏的工作，並未繼承批判而是肯定的介紹，令人感到歷史半途折返。重讀遠景的中文版（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中學兄的大作。¹⁴

這裡所提及「西川滿的工作」是指八〇年代前後葉石濤、張良澤等人譯介西川滿文學之事，陳映真等人針對這樣的譯介活動撰文批判¹⁵。池田同樣也對於這樣的譯介現象語帶批判：「玉稿文中的 H 氏是指濱田氏的事嗎？葉石濤、張良澤氏等年輕世代沒有注意到西川氏的異國趣味中支配者的思想背景、最近頻頻投大眾所好。」¹⁶

由於深懼文甫對於自己戰前的友朋關係不了解，因此在家書中特地介紹了池田先生與台灣的關係：

我收到來自平凡社的池田敏雄先生《亡友記》的抽印本。他是以戴國輝為中心的研究團體中的成員，池田先生以前在龍山國民學校當老師，之

慘的時代。由於當時有美國的潛水艇出沒，我們的船隻似乎按鋸齒形前進，其中船隻停靠在某個灣內。聽說是唐津。由於是深夜燈火管制，因此什麼也看不見。西川氏與濱田氏硬拉張氏說要提案，話說是要將《文藝台灣》與《台灣文學》廢刊，重新創設文藝雜誌。張氏對此「嗯！嗯！」回答，支支吾吾閃爍其詞，始終並未首肯。日後張氏與我將這次的情形稱為『唐津會談』。（龍瑛宗，〈《文藝台灣》と《台灣文藝》〉，《台灣近代現代史研究》第 3 期（1981 年 1 月），頁 87，譯文文責自負。）

¹² 池田敏雄致劉榮宗書簡，日期註記：1980 年。

¹³ 池田敏雄致劉榮宗賀年卡（1980 年 1 月 1 日）。

¹⁴ 池田敏雄致龍瑛宗書簡，日期註記：1980 年。

¹⁵ 王惠珍，〈後解嚴時期西川滿文學翻譯的文化政治〉，《台灣文學學報》第 29 期（2016 年 12 月），頁 79-110。

¹⁶ 池田敏雄致劉榮宗書簡，郵戳日期：1980 年 12 月 16 日。

後和他的台灣人學生結婚。他是過去《民族台灣》(筆者按：民俗台灣)的編撰者，至今仍很關心台灣的民俗。(1977年7月27日)

又，1981年龍瑛宗接到池田的訃聞後，立即捎信希望文甫前往致意：

寫了〈《文藝台灣》的苦楚〉的池田敏雄先生在3月31日往生，接到訃聞，已經先寄了弔慰信。池田先生真的很愛台灣。太太是萬華人，池田先生在龍山國民學校教書的學生鳳姿先生寫過台灣民俗的題材，刊出《七爺八爺》、《七生媽娘》(筆者按：《七娘媽生》)。菊池寬也看過讚譽有加。學生鳳姿先生之後就成了池田先生的太太。

因此，方便的時候請到鳳姿先生家，在靈前捻香。究竟帶奠儀去好？還是帶地方特產去好？請和典子商量決定。(1981年5月14日)

文甫受父親之託，就近前往致意¹⁷。第二年龍瑛宗也親自出席在台北召開的追思會：「時間過得很快，池田先生周年忌日到了。在台北聚集了許多懷念池田先生的人，召開追思會。(1982年4月13日)」

龍瑛宗在同輩作家中屬於長壽者，因此晚年所寫的文章有多篇弔念文友之文，例如：紀念吳濁流的〈冥想〉、紀念楊達的〈血與淚的歷史〉和〈懷念楊達兄〉，文中憶及戰後初期在台南《中華日報》宿舍見面，談了一些文學的問題，楊達移居大溪之後，兩人見面次數變多，他則鼓勵楊達繼續創作。另外，又有紀念益壯會的文友〈文學伙伴王昶雄〉、合作金庫同事〈張我軍之死——高舉五四火把回台的先覺者〉、文心的〈悼文心〉等作品。

(四) 畫作鑑賞和閒談文學

根據劉知甫的記述家中客廳曾掛有義大利畫家莫蒂里安尼(1884-1920)的傑作〈戴寬帽的珍妮〉(1917)黑白的複製畫¹⁸，書齋則掛有但丁的畫作，主角

¹⁷ 陳萬益訪談、柳書琴整理，〈龍瑛宗的戰後：劉文甫先生訪問記〉(1998年1月10日於東京大學)，收於王惠珍主編，《戰鼓聲中的歌者：龍瑛宗及其同時東亞作家論文集》(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11年)，頁481。

¹⁸ 感謝家屬劉杼芳女士協助確認，謹此誌謝。

站在一座橋頭遇見貝德麗采的「永恆的一瞥」，書架上一直擺著托爾斯泰的半身石膏像¹⁹。藉由這些家中藝品的擺設，也可以窺見龍瑛宗的藝術信仰，對美好戀情的嚮往，和對俄國大文豪的景仰之意。

除了親族、日籍友人之外，與龍瑛宗往來較頻繁的還有他的「日語族」友人。戰前由於曾從事雜誌報章的編輯工作，因而戰後初期經常與賴傳鑑、吳瀛濤、鄭世璠等人聚集於藍蔭鼎的台灣畫報社閒談，因緣際會結識了不少省籍畫家。在龍瑛宗七〇年代末的合影照片中，經常可見日、台藝術家的身影例如：顏水龍、黃靈芝、鄭世璠、賴傳鑑、北原政吉等人。龍瑛宗的小說集《夜の流れ》的封面，即是賴傳鑑的贈畫²⁰。龍瑛宗閒暇之餘，經常會與朋友相邀出席在台北的畫展，家書中也會提到：

難得這邊也展出西班牙現代畫展。可以欣賞到畢卡索、達力等大師的畫作，這也令人期待。（？年8月9日）²¹

十月中旬有中日現代名家油畫展，從日本來的有豬熊弦一郎、荻須高德、小磯良平等很有名氣的畫家陣容，相當難得而去觀展。（1978年11月1日）

前者所提及的豬熊弦一郎、荻須高德、小磯良平三人與顏水龍、張秋海都是東京美術學校1927年同一屆的畢業生。當時台灣知名畫家顏水龍、賴傳鑑、呂基正、郭木生、李梅樹等人亦參加這次在省立博物館的交流展。

龍瑛宗偶爾在隨筆中提及欣賞的畫家，例如：「當我在讀一遍日文的〈奔流〉，讀完不無一些感慨。小說裡的登場人物如伊東春生——便聯想起日本有名的畫家伊東深水。他的畫像，實在太棒了。」²²或許因為小說人物姓氏的關係，讓他聯想起這位曾指導過台灣知名女畫家陳進（1907-1998）的東洋畫家伊東深

¹⁹ 劉知甫，〈幻想與讀書 悼念父親龍瑛宗——生命中的兩大支柱〉，《龍瑛宗全集·文獻集》（台南：國家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頁312。

²⁰ 同註19，頁315。

²¹ 信中提到「西班牙現代畫展」應該是指1978年由國泰美術館主辦的「西班牙二十世紀名家畫展」自1978年6月27日起至9月25日為期三個月。（《聯合報》，1978年9月12日，第6版。）

²² 同註5，頁198。

水（1898-1972）吧。總之，無論友人的畫展、中日交流名家油畫展、東洋畫展到西班牙當代油畫展等龍瑛宗皆一一涉獵，累積了不少觀展經驗，藝術美學成為他晚年文化生活的滋潤，在展場駐足鑑賞畫作成為他的另一種作家身影。

戰後台籍文友們則經常藉由「幾何會」、「益壯會」²³聚首閒談，形成戰前世代特殊的文化社群，雖自謙「閒談」，但他們也會涉及嚴肅的文學觀的討論。根據如下黃靈芝（1928-2016）致龍瑛宗的書簡，似乎可窺得一二：

試著再一次慢慢思考先生的論說，因為有些是困難的問題……。只是誠如你所言，在作品的背景中，好像沒有結實地扎根，我自己也些許地感覺到，也領悟到好像太過依賴觀念。但是，另一方面，例如芥川龍之介批評有島生馬的「嘘の實」（謊話的真實）所言，「小說並非那樣」。我對於這樣的講法非常地反抗。我的想法是，小說想怎樣寫就怎樣寫，剛好畫壇出現了一人一派的說法，我想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沒錯吧！（當然，其中包括各種麻煩的問題吧）

這個冬天高橋喜久晴（詩人）、李沂東（詩人、韓國人）、小堀用一郎（文學家、本田（筆者按：多）秋五氏的外甥）預定來訪，到時候我們一起吃個飯吧！²⁴

²³ 根據塚本照和所言：其實該會緣起於曾經任職文獻委員會的王詩琅先生以及廖漢臣先生的時代，當時一些彼此相知相惜的文化界老前輩們，固定每個月聚會一次，大家邊用餐邊「閒談」。而與會人士們就自謙此「閒談會」為「散人會」，大家暢所欲言，樂在其中。（中略）您卻挺身而出提議說：「我們雖然已經老了，但可是一點也不能輸給年輕人呢！」。於是，這「散人會」就改名為「益壯會」了。塚本照和著，張桂娥譯，〈追憶王昶雄先生〉，《淡水牛津文藝》第8期（2000年7月），頁57。

²⁴ 黃靈芝致龍瑛宗宛書信，（1981年7月14日）。書簡的年分不清楚。根據張默的〈中國現代詩壇卅年大事記〉（《中外文學》10卷12期（1982年5月），頁258-259）1981年12月15日的記事：「由中日韓三國六位詩人白萩、桓夫（中）、秋谷豐、高橋喜久晴（日）、具常、金光林（韓）共同策劃編選的《亞洲現代詩集》第一集，在日本東京出版，此集共收105位亞洲各國詩人的作品。隔年1月15日召開「中日韓現代詩人會議」，日本詩人秋谷豐、高橋喜久晴等七人出席參加。韓國詩人金光林、李炯基、許世旭等十一人參加，在《笠》詩刊的會議紀錄（〈中日韓現代詩人會議文獻〉，《笠》第107期（1982年2月），頁59-61）只記錄三國代表團的團長發言紀錄，未見出席名單，所以無法確認李沂東、小堀用一郎的名字。因日、韓詩人同時訪台的機會並不多，他們很可能同時出席這場會議行程。同時信中又提到冬季到訪，因此，推測這封信可能是1981年。

龍瑛宗在公開場合鮮少高談闊論，誠如李敏勇所言：「看到龍瑛宗的身影，處於虎虎生風的吳濁流身旁，於疲削硬挺的楊逵身旁，於自信滿滿的巫永福身旁，於靈巧慧詰的王昶雄身旁……龍瑛宗彷彿——垂柳，只有笑容沒有話語。」²⁵但他欲言之詞都已化成文字，留存在私人的書簡往來中，他的文學評論似乎也讓黃靈芝對小說創作思考一番，由於兩人都相當重視文學藝術性的作家，「文學」應是他們跨世代最重要的交流語言。

（五）享受閱讀與文學記憶

龍瑛宗最大的生活樂趣就是閱讀，從年輕到台北就學起便經常到書店站讀，在家中同樣經常靜默地在書齋看書，徜徉在個人的閱讀世界中。綜覽書信中的閱讀書單，可見除了友人寄贈的日文書籍之外，他也會積極地借閱日文書籍或近期雜誌。另外，1979年邱永漢返台投資，在台北創立永漢書局，也成為他「獵書」之地。在書信中他總會寫上幾句個人的閱讀情況與感想例如：

最近讀完今村太平所寫的《志賀直哉的自卑》（《志賀直哉のコンプレックス》）。他雖然是電影人，但這本評論寫得很好。（1975年10月22日）

嵐義人寄送《天上の花—三好達治より—》和《回想太宰治》兩冊。這兩本書相當有趣，我一口氣就把他讀完了。我已經寄了致謝函，若有機會見面的話，請向他說聲謝謝。（1980年10月28日）

我想要讀《重臣たちの昭和史》（1982年1月15日）。

今天早上在《世界》讀了石垣綾子的自傳〈過往與足跡〉，得知她為了出書請住在紐約的林語堂寫推薦序，對方很高興地答應了。那是太平洋戰爭前撰寫反對侵略中國的書。話說林語堂已經去世了，他現在就長眠在台北的墓園裡。

²⁵ 李敏勇，〈在夜暗中幽微的月—紀念龍瑛宗〉，《淡水牛津文藝》第6期（2000年1月），頁83。

昨天順道前往邱永漢書店看看，那邊備有新潮、角川文庫等日本名著相當豐富。《二十四個瞳孔》（《二十四の瞳》）也放了幾本。石川啄木的作品依舊廣受日本人喜愛的樣子。（1982年10月8日）

最近讀了廣津和郎的〈年月のあしおと〉和吉行淳之介的〈私の文学放浪〉。我曾經在昭和十九年（筆者按：昭和十七）和直杉靜枝（按：真杉靜枝）一起到世田谷廣津的家裡拜訪。直杉是與台灣有所淵源的女流作家，曾與武者小路同居。印象中當時的話題與萬歷（筆者按：曆）瓷器和中野重治有關。我曾讀過中野重治寫過的《海涅人生讀本》。院長桶詰先生也經營短歌雜誌《あらたま》。在這本書中並沒有提及松川事件。在吉行的書中，小說的文章有失其陳腐和留其餘光，這也是一種見識。（1983年2月8日）

根據筆者的查閱，家書中提及的書籍內容，有的是雜誌的連載文章，有的單行本，單篇文章多是八〇年代近期的文章，單行本則多是五〇、六〇年代的書籍。從書信內容也可知龍瑛宗閱讀與寫作之間的關係，例如他是在閱讀廣津和郎的〈年月のあしおと〉和吉行淳之介的〈私の文学放浪〉之後，才撰寫了〈回顧日本文壇〉（《台灣文藝》第84期，1983年9月）一文，並轉譯書籍內容，進而憶及戰前的旅日經驗。

戒嚴時期日文書籍取得不易，他主要是透過兩個管道取得日本相關的最新資訊：一個是任職的合作金庫，因業務之需銀行訂購了日本主要的報紙，因此他有機會定期閱讀最新報刊；另一個是有一位遠親劉興炎先生因在調查局服務，他主要的工作是翻譯日本書籍，後來他當上第四處資料科科長，龍瑛宗從他那裏借了不少日本的《世界》、《中央公論》等雜誌以及書籍²⁶。戰後在台日文書刊的流通雖遭到官方嚴格控管，但他仍透過可能的管道，以日文認識戰後日本的社會發展情況，汲取島外訊息，掌握當時的國際情勢，充分展現出日語菁英世代透過閱讀追求知性的堅持。

²⁶ 同註17，頁477。

朝鮮作家金史良（1914-1950）是少數戰後仍受到日本文學界關注的戰前殖民地作家，《文藝》（1971年5月）和《新日本文學》（1972年12月）甚至特別刊出金史良的追悼特輯。出版界也出版了金宇植的傳記研究《金史良——その抵抗の生涯》（東京：岩波書局，1972年），隔年1973年河出書房新社發行《金史良全集》四冊。家書中寫到：「跟親戚劉興炎先生借了《中國研究》6月號讀了〈台湾の文学を訪ね〉，其中刊有《評傳 金史良》，記得日本時代曾收過他的信。（1984年11月1日）」信中提及的《評傳 金史良》（東京：草風館，1983年），應是指金宇植的《評傳 金史良》的書籍廣告。戰前兩人曾因《文藝首都》主編保高德藏（1889-1971）的關係互有書信往來²⁷，戰後再次看到金史良之名，讓他勾起戰前的回憶和保存了四十三年前的書信。文甫留日期間，曾受父親之託拜訪過保高德藏，然而戰後龍瑛宗試圖重返日語文壇之際，保高卻早已成故人。另外，書信中提及的〈台湾の文学をたずねて〉，是指中國研究所發行的《中国研究月報》第436期（1984年6月）的特輯，是八〇年代日本雜誌中最早介紹台灣文學的專刊特輯，其中松浦恒雄的〈日本統治期の老作家たち〉²⁸中提及龍瑛宗，他也因而一直關注在日台灣文學被介紹的情況。

總而言之，龍瑛宗戰後因職場之便和遠親劉興炎的協助，讓他得以繼續閱讀日文書刊，藉以滿足個人的閱讀欲望。他也藉由閱讀日文書刊，譯介當代日本文壇的動向，回憶隨筆因個人自我檢閱，並且在符合戰後台灣的抗日文藝史觀的原則下，召喚殖民地的文學記憶。

（六）在日人際網絡的重建與海外記遊

龍瑛宗六〇年代因為劉文甫大學院入學申請的問題，經吳濁流介紹與戰前友人工藤好美教授重新連絡上²⁹，向他諮詢日本大學研究所的情況。當時任教

²⁷ 下村作次郎，〈台湾文学の戦後初期〉，《文学で読む台湾》（東京：田畑書店，1994年），頁210-212。

²⁸ 澤井律之教授接受筆者諮詢，指出：這群譯者和作者主要是當時任教於神戶大學的山田敬三研究室的研究生，他們利用假期來台進行大規模的交流，承蒙吳錦發先生熱情接待，南下前往高雄鍾理和紀念館參訪。

²⁹ 工藤好美致劉榮宗書簡，日期1962（？）年10月6日。

於青山學院的工藤建議若選擇經濟領域的話，早稻田大學有其傳統會比青山學院較佳。之後，兩人繼續書信往來，其中一封還提及他擔心吳濁流的病況³⁰。1963年3月文甫搭乘貨船「台東輪」，接受建議赴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經濟碩士留學，在學期間曾多次拜訪工藤家³¹。1967年9月工藤也受邀來台，與戰前台籍學生相聚重逢³²。

戒嚴時期台灣人出國海外旅行不易，需要有「身分」才能出國，根據信件內容：「由於今年工作即將結束，明年想以業務部主任的名義出國，這個期間想去東南亞。」（1978年11月1日）。可見，1978年龍瑛宗才有機會利用合作金庫「業務部主任」的身分出國，前往東南亞旅行。1980年他又再度出訪，在1980年3月5日的家書中清楚交代了旅遊見聞，並將部分內容改寫成中文隨筆發表〈走馬看東南亞〉一文。根據劉文甫的回憶³³，戰後龍瑛宗共訪日五次，1980年5月才第一次到東京探訪他與家人。第二次1983年則是隨團參加歐非之旅時，過境東京時在日與文甫見面。龍瑛宗返台後將行旅見聞〈歐非之旅〉（1983年12月1日）發表於《開南校友通訊》。第三次是1986年前往日本山陰和關西地區旅行後，轉往關東文甫家中小住。第四次是1988年秋天第一次訪中，行程結束後繞道訪日。後來竟因中國未有親戚擅自訪中，違反法令而被禁止出國一年。1989年因計畫前往日本東北賞楓、北海道旅行才又再度訪日³⁴。最後一次訪日期間特地拜會戰前西川滿等人³⁵。上述的這些海外旅遊見聞也成為他晚年的隨筆題材，但在他的隨筆中拜訪西川滿之事卻隻字未提，可見龍瑛宗的謹慎態度。

³⁰ 工藤好美致龍瑛宗書簡，日期：？年12月29日。

³¹ 同註17，頁479。

³² 周芬伶，《龍瑛宗傳》（台北：聯經出版社，2015年），頁229。

³³ 劉文甫，〈龍瑛宗の戦後の日本訪問について〉，未刊稿。在此特別感謝劉文甫先生以此稿（2017年10月）詳盡地回覆筆者的提問。

³⁴ 同註33。

³⁵ 劉文甫，〈同時代的兩位作家——龍瑛宗與西川滿〉，《新竹文獻》第49期（2012年6月），頁7-12。

三、戰後龍瑛宗的文壇復出

龍瑛宗戰前雖是台灣文壇的知名作家，但戰後為求明哲保身鮮少在公開發表文章，以一介銀行員「劉榮宗」低調度日，但退休後他又再次燃起文學夢。

八月底我的上班族生活將告終，四十五年間的漫漫長路。很幸運地，期間有數年專門委員的閒職，應該可以適應新的生活。之後注意健康，並想要寫下殖民地台灣人被扭曲的生活。這些不幸的台灣人沒有多久將被歷史的浪濤所埋沒而去。由於我已遠離實務工作，因此資料調查或許非得請知甫幫忙不可。（1976年8月14日，底線為筆者所加）

在黃武忠的專訪中他也自道：「我所以不停的寫，只是不願讓這一段歷史成為空白，想藉着文字給子孫們留下紀錄，讓他們瞭解在異族統治下所受到的羞辱和無言以對的痛苦。我實在有責任記下這段坎坷的經驗。」³⁶他身負強烈的歷史責任感，以「歷史見證人」的身分積極地寫作復出文壇，但「語言」的問題卻一直困擾著他。任職合作金庫期間，中文文件多仰賴同事張我軍、文心、盧福地等人的協助，在家得請教子女或孫女³⁷。重新執筆的初期，他對自己的中文並沒有太大的信心，故仍以日語寫作，撰寫了〈媽祖宮的姑娘們〉（未刊稿，1977年6月脫稿）、《紅塵》和〈夜の流れ〉等作品，然而，龍瑛宗以日語重新寫作的意念，是在怎樣的情況下被撩撥而起的呢？以下將依序說明復出過程。

（一）川端康成的到訪

川端康成（1899-1972）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身分，受中華民國筆會會長林語堂（1895-1976）之邀，1970年6月16日出席在台灣召開的國際筆會第三屆亞洲作家會議，並在中泰賓館以〈源氏物語與芭蕉〉為題發表演說。川端來台時備受台灣媒體關注，島內的報章雜誌爭相報導，也留下部分當時的影音

³⁶ 黃武忠，〈歷史的見證人〉，《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作家小傳》（台北：時報文化，1980年），頁115。

³⁷ 龍瑛宗，〈小老師〉，《龍瑛宗全集·隨筆集（2）》，頁117。

檔³⁸。《中國時報》針對官方行程進行系列報導，但文中並未提及省籍作家與來訪日籍作家們的互動情況。王藍也特地在《東方雜誌》上連載詳述邀請川端來台的行程與各國作家的交流情況³⁹。吳濁流是少數撰文回應此次活動的省籍作家，文中他感佩川端對日本古代文學研究之徹底，對中國古典文化造詣之深，但字裡行間不時顯露出他對主流媒體訪談內容太過膚淺的諷刺之語⁴⁰。在這場活動中川端只進行了一場公開的演講，被認為是位甚為「木訥」的作家⁴¹。然而，豈知川端等人的訪台過程竟與台灣日語作家互動熱絡，並產生後續的影響力。

黃得時認為張文環七〇年代復出寫作，除了受到他的鼓勵之外，主要仍與川端康成等人的訪台有關。因為在大會閉幕後，21日與會的一行人南下前往日月潭風景區觀光，根據22日的報導官方主要由新聞局長負責接待，並安排投宿涵碧樓和日月潭大飯店⁴²。晚飯後，黃得時向川端提起張文環戰前的文學事蹟，同行第一次訪台的巖谷大四也憶及在戰前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中，曾與張文環有一面之緣。因此在彭歌的陪同下一行人造訪當時任職於日月潭大飯店的張文環，相偕在附近的小館子徹夜長談，直到凌晨一點半才散會。這次的見面讓張文環得到了莫大的鼓勵⁴³。此後，他開始積極地擬定撰寫三部曲的計畫，但只完成第一部《地に這うもの》後卻因病驟逝，甚為遺憾。這場會議結束後，黃靈芝也帶領中河与一（1897-1994）及《七彩》俳句會的主持人東早苗南下參訪台南，東早苗給了他一些鼓勵，進而讓他決意成立「臺北俳句會」⁴⁴。

其實，在川端訪台之前，當時負責接待的黃得時事前就曾諮詢過龍瑛宗，劉知甫回憶：「川端康成曾應邀來台訪問時，接待的台大教授黃得時先生，曾在

³⁸ 「國際筆會第三屆亞洲作家會議」，（來源：<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31/a6/73.html>，2018年5月16日）。

³⁹ 王藍，〈國際筆會與文化交流〉，《東方雜誌》4卷4至6號（1970年10-12月），頁61-67、70-77、57-74。

⁴⁰ 吳濁流，〈川端康成先生演講的弦外之音〉，《台灣文藝》7卷29期（1970年10月），頁3-5。

⁴¹ 不著撰者，〈秦時明月〉，《中國時報》，1970年6月27日，第3版。

⁴² 不著撰者，〈亞洲作家代表昨暢遊日月潭〉，《中國時報》，1970年6月22日，第6版。

⁴³ 黃得時，〈張文環氏與臺灣文壇：從「福爾摩沙」、「臺灣文學」到「在地上爬的人」〉，《張文環先生追思錄》（非賣品，1978年），頁46-47。

⁴⁴ 岡崎郁子著，戴嘉玲譯，〈戰後台灣的日文文藝研究—以黃靈芝為中心11〉，《台灣文學評論》4卷1期（2004年1月），頁161-162。

電話中事先與父親討論作品的精華重點。」⁴⁵川端訪台顯然讓沉寂多年的台灣日語作家的文友圈泛起些許的漣漪。張文環的《地に這うもの》（現代文化社，1975年）順利在日出版後，也間接地刺激了龍瑛宗重新以日語創作的意欲。

（二）《紅塵》的撰寫出版與日本友人的邀稿

描寫台灣小知識分子的時代處境是龍瑛宗跨時代的文學母題，退休後的書寫計畫仍繼續圍繞在這個文學母題之上，每天固定寫作，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將他醞釀多年的題材，寫成長篇小說《紅塵》一作，根據家書亦可以清楚地了解他的寫作軌跡。

我正在寫長篇小說，已經寫好兩百多張稿紙。我想描繪兩個時代的變動。今年大概會花大部分的時間在這項工作上吧。（1978年5月30日）

寫完了340張稿紙的長篇小說。因為到目前為止從未寫過這麼長的小說，感到非常困惑。深感構想能力的重要性，也需要體力。將實際不存在的事物，描寫成存在的樣子，需要操縱文章的能力。（1978年8月31日）

我已經寫完長篇《紅塵》五百多張（四百原稿用紙）了，最後的五十張中小說人物都已悉數露臉，因此打算就此結尾。（1978年11月1日）

從家書撰寫的時間推估，龍瑛宗三個月才寫了四百字稿紙一百多張，粗估每天平均約莫寫一、兩張稿紙而已。這篇小說原以「日語」寫成，「戰後的日本讀者」是他創作時的預設讀者，人物以「跨時代」的台灣知識分子為主，延續他的「小鎮」書寫，因此，第一章的標題就以「荔枝鎮上」開始（Being），說明中國楊貴妃的典故。雖然以描寫「戰後」的台灣社會為主，但主要人物之一的黃廷輝的敘事時間，猶如鐘擺一般，當它擺向「日本」時，殖民地記憶等便會跳躍至「戰前」的時空中展開敘事，因此小說情節安排上今昔錯置，對多年未鍛鍊「操縱文章能力」的龍瑛宗而言，寫起來似乎有些力不從心之感。

⁴⁵ 劉知甫，〈憶父親的文學魂〉，《淡水牛津文藝》第6期（2000年1月），頁98。

龍瑛宗亦曾詢問塚本照和、下村作次郎《紅塵》在日出版的可能性，同樣未能如願出版。直到 2002 年才以文獻史料的形式收入綠蔭書房出版的「台灣長篇小說集系列」中⁴⁶。下村特地在〈解說〉中說明龍瑛宗的日語問題：這篇作品是作者停滯三十年重新創作的作品，而非是在戰前日語寫作高峰期所寫的作品。在戰後中文的台灣社會中，如黃廷輝所說日語能力必然會衰退，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新的中文卻烙印其中，即是這篇作品的特異表現。從文學的觀點來看，這樣的語言環境對作家很不利⁴⁷。即使委由鍾肇政翻譯連載於《民眾日報》的副刊之上，仍未能得到「戰後台灣讀者」的青睞而中止連載，這或許就是跨時代作家最大的無奈吧。

除了前述的池田敏雄曾向龍瑛宗邀稿之外，北原政吉（1908-？）是鼓勵龍瑛宗戰後重新以日文撰稿發表的重要人物。北原在日本大正年間來台，就讀台北師範學校期間，深受石川欽一郎影響，畢業後進入日本大學藝術科深造。畢業後返台擔任小學校教員，並以詩人和畫家的身分活躍於台灣文藝界，在《台灣日日新聞》發表多篇詩作與小說。1939 年 9 月與西川共同創立台灣詩人協會，活躍於當時的詩壇。戰後加入《笠》詩刊，其中與陳千武的關係最好，並在他的引薦下促成由熊本もぐら書房出版了《台灣現代詩集》（1979 年 2 月）和《續・台灣現代詩集》（1989 年 5 月）⁴⁸。1978 年他因報導取材和雜事訪台，前往芳蘭美術會位於台北中山北路的中央大樓舉辦的展場看畫，當他找到自己的畫作挨近鑑賞時，有位小個子的中年紳士轉頭過來，默默地靠近兩三步，小聲地說：「是北原先生嗎？我是龍瑛宗」。三十六年未見的兩人在畫展會場上意外重逢⁴⁹。之後，北原訪台時多次與龍瑛宗等人相偕拜訪戰前文藝友人。龍瑛宗也在北原的引薦下，認識了灣生宮崎端，家書中亦提到：

⁴⁶ 塚本照和，〈龍瑛宗氏の「寡黙」と「微笑」〉和下村作次郎〈龍瑛宗《紅塵》解説〉，收於下村作次郎編，《台灣長篇小說集》（東京：綠蔭書房，2002 年），頁 490、521。

⁴⁷ 同註 46，頁 513-522。

⁴⁸ 中島利郎，〈北原政吉〉，收於中島利郎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小事典》（東京：綠蔭書房，2005 年），頁 16。

⁴⁹ 北原政吉，〈龍瑛宗氏について〉，《だぁひん》第 5 號（1979 年 5 月），頁 21。

接著是《夜の流れ》這篇 66 張稿紙的作品，將刊登在熊本不定期出刊的雜誌「DAHIN」上的事情。

DAHIN 這詞出自歌德小說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中的角色 Mignon 的故事「認識你的地方啊南之國」（「君よ知るや南の国」）的結尾「往彼方、往彼方」（「彼方へ、彼方へ」）Dahin、dahin……。7 月左右會出刊的樣子。這本雜誌由經營海鷗印刷（かもめ）和地鼠書店（もぐら）的宮崎先生所出版。宮崎先生自己也寫小說。然而日本文壇的水準很高，無法回本的書是不會被出版的。（1978 年 5 月 30 日，底線為筆者所加）

是故，龍瑛宗本想委請宮崎協助出版《紅塵》，但考量日本商業出版的情況，又不得不作罷。但是他仍受邀在宮崎主持的同人誌《だぁひん》上發表短篇小說〈夜の流れ〉，並重新連繫上戰前文壇日籍友人：

名叫小石原妙子小姐的住在福岡⁵⁰，她出生於台南，在台北時代曾介紹她到《台灣公論》社。我的小說〈夜流〉近期內會刊於熊本的不定期刊物《だぁひん》，我委託小石原小姐如果拿到雜誌就寄送到你那裏。
（1978 年 9 月 22 日）

與北原政吉重逢後，龍瑛宗也曾寫信給東京的西川滿並附上〈夜の流〉一作，但是 1979 年西川滿早已遠離文學界，因宗教興趣持續編輯《アンドロメダ》刊物⁵¹。〈夜流〉是龍瑛宗戰後在日被刊出的第一篇日語小說，給予他莫大的鼓勵，根據書簡：「在台北見到《だぁひん》的發行人宮崎先生，他向我邀稿，使我考慮撰寫〈夜流〉的續篇。書寫殖民地時代的人已經沒有幾位了。」（1979 年 9 月 27 日），但因《だぁひん》只出刊至第五號。由於日語小說遲遲無法順利發表，幾經挫折後，他不得不重新衡量以日語創作重返文壇的可能性。

⁵⁰ 信中提到小石原妙子即是丸井妙子。台南出生，畢業於台南第一高等女學校。受教於當時濱田隼雄，因濱田的介紹將其隨筆投稿至《台南新報》和《台灣婦人界》。1943 年因父親病故移居台北，該年秋進入田上忠經營的台灣公論社。返日後與小石原勇結婚，回到小石原故鄉福岡定居。中島利郎，〈丸山妙子〉，收於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小事典》（東京：綠蔭書房，2005 年），頁 96-97。經筆者與中島教授確認，人名誤植應是丸井妙子。戰後與龍瑛宗有書信往來。

⁵¹ 西川滿致龍瑛宗書信，日期：1979 年 7 月 30 日。

（三）重新受到研究者和新世代作家的關注

塚本照和是較早與龍瑛宗往來的日人研究者；張良澤經鍾肇政引薦是最早關注龍瑛宗的台灣文學研究者。在家書中龍瑛宗提到：「書寫殖民地時代的人已經沒有幾位了。天理大的塚本教授到家裡作客，因而共進晚餐。」（1979年9月27日）。又，根據塚本照和致龍瑛宗的書信（1980年8月29日）可知，1980年他來台時龍瑛宗曾提供自己的〈著作年表〉和〈斷雲〉的影印資料給他。同年他創設發行《啞啞》雜誌時，發表〈日本統治時代の台湾における文学管見〉一文中論及〈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隨後龍瑛宗也寫了〈幾山河を越えて〉⁵²刊於《啞啞》，這篇看中雖可見他評論當代台灣文學的意欲，唯湧現的回憶文字稀釋掉他批評的力道。另外，他在家書中也提及：

之前，威斯康辛大學的美國女性來訪，由於撰寫台灣文學相關的博論，有需要取得我的作品資料。

前幾天和天理大的塚本教授在中國大飯店見面，他說正在編制台灣文學年表，順便想製作我的作品年表。如果大家想要的話，想說今後將試著一點一點地整理作品。（1981年7月27日）

根據張良澤致龍瑛宗的書信（1982年4月20日），張良澤先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譯者自我介紹，並向龍瑛宗索取作品。在信件中張也附上在日開課表和上課內容概要，整理的〈日本に於ける台湾文学研究専門著書〉和〈戦後日本で出版された台湾文学作品集〉的表格，因此龍瑛宗特地商請文甫轉交資料：

筑波大學有中國文學講座，而特別課程有①台灣文學的成立②中國新文學對台灣文壇的影響③戰後台灣作家及作品介紹，這項目由張良澤先生擔當。張氏曾在日本留學，為關西大學增田涉老師的門生。

張氏寫信給我，希望能拿到我的作品資料。因此希望你 copy 那邊現有的「夜の流れ」與「勁風與野草」給他。（1982年5月6日）

⁵² 龍瑛宗，〈幾山河を越えて〉，《啞啞》第24、25期合併號（1989年7月），頁12-13。

誠如上述八〇年代後國內外學者逐漸關注到戰前台灣日語作家的文學成就，由於來訪學者不斷地詢問他的生平、創作資料等，促使他有意識地重新整理自己戰前的作品和製作寫作年表。

旅居加拿大東方白因為讀了龍瑛宗發表於《台灣文藝》的〈給文友的七封信〉⁵³後，透過鍾肇政轉交信件給他。信中對於龍瑛宗的「第六封」有關政治小說的評論特別認同，東方白對《台灣文藝》的發展方向似乎有所不滿。信中寫道：

而今の《台灣文藝》竟然畫地自限，□「政治」而將其他一概拋棄，無不短視淺足，無可理喻？虧您與楊逵兩人站起來說話，用老人的拐杖杵杵這些小孩的屁股，否則這樣「政治」下去，台灣文學將一無所成！⁵⁴

東方白原本只是想向前輩作家透過書信抒發一下悶氣，龍瑛宗竟認真地回信給他，讓他感動不已。在回覆的信函中，龍瑛宗寫道：「政治解決短暫問題，文學面對永恆問題」之語讓他深表贊同，東方白又回信提出「日據時代五十年，台灣前輩作家給後代留下什麼好作品？」等問題。期待「您們前輩作家□□理應說話比較有份量，及時給後輩作家一些您們的親身經驗，免得他們又重蹈 100 年前日本政治作家的覆轍，把大好的青春浪費在毫無永恆價值的『政治文學』上。」⁵⁵許維育認為龍瑛宗每每遇到政治相關的話題，就會模糊其詞，閃躲迴避的情形，晚年的隨筆多寫自己、寫文學、寫過去⁵⁶。若根據東方白的書簡推敲，八〇年代復出的他同樣地一如往昔，對於「文學」的興趣遠勝過「政治」，畢竟他所追求的還是文學的「永恆」。

（四）建立以中文寫作的信心與副刊主編的邀稿

退休後龍瑛宗更加勤練中文，七七年的鄉土文學論戰過後，戰前台灣日語作家重新受到關注，作品陸續被翻譯重新出土。龍瑛宗也趁這一波翻譯熱潮「以

⁵³ 龍瑛宗，〈給文友的七封信〉，《台灣文藝》第 87 期（1984 年 3 月），頁 169-180。

⁵⁴ 東方白致龍瑛宗書簡，日期：1984 年 4 月 15 日。

⁵⁵ 東方白致龍瑛宗書簡，日期：1984 年 5 月 15 日。

⁵⁶ 同註 1，頁 134。

譯代寫」，翻譯自己戰前的詩作與短篇小說，例如 1979 年自譯〈黑少女〉（6 月 5 日）和〈白鬼〉（6 月 15 日）等作品，藉以提升自己的中文書寫能力。譯作刊出後受到中文讀者的肯定，也讓他重拾寫作的信心。根據許維育的整理分析，龍瑛宗在 1982 年至 1986 年左右曾有計畫地準備了一些寫作題材，使用中文以「掌篇小說」的小說形式開始寫作，這些作品的題材多源自於他的生活經驗、見聞和想像之作，1984 年 3、4 月內寫了十多篇小說，刊於兩大報副刊。然而，在這期間他雖有構築第二個文學夢的雄心壯志，但仍面臨退稿與無處可投的困境。之後，掌篇小說的數量逐漸減少，但隨筆增多，但卻發生文體混亂的問題⁵⁷。若從書信的內容觀之，這個時期他主要是以台灣「前輩作家」之姿，接受當時各大報紙副刊主編的邀稿。因此，在家書中也特別提及自己在報紙副刊上發表的情形。

這邊的文化界日漸穩定嗎？關心起日本時代的台灣文學。新聞報紙上刊出昭和十七年的短篇小說譯作，意外獲得好評。我正在翻譯自己的日文詩。與日本時代不同，這邊包括大學生讀書層人數較多。由於對純文學感興趣，因而出版社來說要出我的小說。（1979 年 4 月 2 日）

我寫了〈勁風與野草〉這篇小說，昨天寄給聯合報。這篇是描寫自昭和 12 年到昭和 19 年的時局變動。對台灣而言，我想它將成為一篇文獻。（1982 年 1 月 15 日）

時報出版公司的人希望是小說，所以我答應將十年前寫的日語小說〈月黑風高〉自譯交付。原稿已交付給他半個月了，只是不知道何時才會出版，沒辦法中國什麼「慢慢的」。（1986 年 6 月 10 日，底線為筆者所加）

可見台灣中文讀書層的關注和支持，再加上龍瑛宗鍥而不捨的學習努力，逐漸走出「以譯代寫」的過渡階段，駕馭中文的能力不斷地提升。「我在光復當時曾寫過兩篇小說，現在正翻譯成中文。在那之後我的筆走向寂靜，持續了三十年之久。我的中文不用再拜託別人，多半可以寫了。（1983 年 5 月 2 日）」可見，

⁵⁷ 同註 1，頁 125-129。

1983 年左右龍瑛宗使用中文書寫才較為得心應手，他也積極地在報紙副刊和校友刊物《開南校友通訊》等發表中文作品。

但當時龍瑛宗的中文寫作程度究竟如何？或許透過版本對照可以窺得一二。《龍瑛宗全集·小說集(3)》同時收入了〈神兵隊〉、〈理髮師〉、〈詩人的華爾滋〉的「未刊稿」和「已刊稿」兩種版本，「未刊稿」寫於 1982 年 6-7 月之間，「已刊稿」則陸續發表在當時的報紙的副刊上，如下表格例句出現明顯的版本差異。

篇名／例句版本	未刊稿	已刊稿
〈神兵隊〉《中國時報》副刊，1984 年 5 月 18 日	「有一天，於東門的日人宿舍裡，敲門扉造訪，黑木喜色以眉宇，破顏連說：「進坐。」」（頁 218）	「禮拜天的上午，杜南遠前往於東門的日人宿舍裡。敲敲著門扉，「誰呀？」叫著嘶啞聲的黑木，終於開戶了。「哇！你是杜南遠桑。請進，請進。」黑木喜色以眉宇，連忙說道。」（頁 216）
〈詩人的華爾滋〉《中國時報》副刊，1984 年 5 月 19 日	現在，請 K 氏來登場。」（頁 228）	「透過詩人 K 氏的經驗，我們不妨回味舞廳況味。（頁 226）
〈理髮師〉（《自立晚報》副刊，1988 年 5 月 17 日）	「隔壁是理髮店，阿河哥是農家來被僱的剃頭師傅。」（頁 218）	阿河哥是來自農家的剃頭師傅，受雇於隔壁理髮店。」（頁 220）

對照小說修訂前後的內容，基本上文意並未出現大幅的更動，但文句更加通順，句子間的邏輯性更清楚易懂，但多少仍保有跨語作家的「拙趣」。究竟是誰幫龍瑛宗修訂這些作品呢？還是龍瑛宗的中文進步實情呢？目前仍無法確認⁵⁸。然而，這些文字正是龍瑛宗跨語寫作不磨滅的痕跡，屬於他後殖民文學特有的跨語文體。

⁵⁸ 筆者曾請教過當時擔任《自立晚報》副刊主編的向陽教授，他說：他尊重作者，未擅自修改作者作品。因此，歷經六年的鍛鍊，版本之間的差異或許正具體地顯現龍瑛宗中文程度的進步成果，但因為尚未有另一有力的論據，故筆者尚保留之。

龍瑛宗雖然不善言詞，但仍積極參出席本省籍作家的文藝活動和聚會，例如擔任吳濁流文學獎的評委，參加文學營等。鍾肇政對龍瑛宗戰後文壇的復出功不可沒，鍾肇政主編《民眾日報》副刊、《台灣文藝》期間，曾大力協助譯介、刊載龍瑛宗的作品，並為他潤筆修訂，例如〈白鬼〉雖是龍瑛宗自譯的作品，但因文章字句深受日文影響，鍾肇政為此大改一番，甚至建議他將小說最後〈老黑喬〉的英文詩刪除，因為龍瑛宗認為這篇作品是他第一篇夾雜英文的小說，為了紀念反對刪除英文。可見，鍾肇政應該曾為龍瑛宗修改過中文譯稿等。

除了《民眾日報》之外，《大華晚報》「淡水河副刊」的主編吳娟瑜（1948-）也曾寫信向前輩作家邀稿⁵⁹，吳娟瑜致龍瑛宗書簡中寫到：

各位文壇界前輩，您好！娟瑜自主編淡水副刊以來，總是希望版內的內容更具水準，更為豐富。然而這也是需要各位前輩的協助與指教！淡水河副刊預計在十月推出「愛與溫暖」系列作品特邀請您撥空為我們寫一篇，好嗎？（1986年9月5日）

顯然，除了龍瑛宗之外，副刊主編以此信廣邀「文壇界前輩」。另一位戰前台灣日語作家陳火泉早在1982年10月11日起到1985年11月即每週在《大華晚報》的「人生點線面」專欄發表一篇文章，1986年2月由九歌出版社集結出版《人生點線面》一書。又1986年3月起也應「淡水河副刊」之邀，每月在「我思我行」專欄上寫兩篇，1989年10月再由九歌出版社出版《我思我行》一書，成為跨時代跨語的散文家⁶⁰。同樣地，因《大華晚報》的邀稿，龍瑛宗才有多篇作品發表其上。當時省籍作家的發表空間甚為有限，報紙副刊顯然是他們復出很重要的發表園地。

除了以台北地區的《大華晚報》之外，龍瑛宗晚年在全國性的大報《聯合報》副刊上發表的作品最多，箇中原因為何呢？應該與副刊主編痲弦（1932-）的鼓勵有關。痲弦經黃武忠（1950-2005）居中聯繫，1982年邀集了多位日治

⁵⁹ 陳采琪，《跨時代的「皇民文學」作家——陳火泉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年），頁168-169。

⁶⁰ 龍瑛宗，〈白鬼的讀者〉，《龍瑛宗全集·隨筆集（2）》，頁126-128。

時期老作家們同遊淡水紅毛城，活動結束後向他們邀稿⁶¹。龍瑛宗因而下定決心，不管寫得好壞，一定要用中文創作，也鼓勵王詩琅（1908-1984）重新提筆寫中文小說⁶²。其實在這之前，龍瑛宗已繳出他的中文代表作〈杜甫在長安〉（1980年10月25日）。在家書中龍瑛宗清楚地交代他的參考文獻，和這篇作品被轉載的情況：

參考《長安の春》、《杜甫私記》寫了短篇小說〈杜甫在長安〉。25日光復節發表於《聯合報》上。（1980年10月28日）

〈杜甫在長安〉轉載於舊金山的《世界日報》，有趣的是送來新台幣六百元的稿費。姑且不論，在中國新文學中以杜甫為題材的小說，我不會是第一位吧。要是這樣中國的文化也太貧瘠了吧。（1981年2月23日）

他雖然參閱了日文文獻石田幹之助的《長安の春》（1941年）、吉川幸次郎的《杜甫私記》（1950年），然而，這篇小說與其說是歷史的再現，不如說是作家文學想像的馳騁。這篇作品是他戰後第一篇中文小說，刊出後給予他莫大的鼓舞。痲弦特地寫信鼓勵：「果然寶刀未老，很精彩。」（1980年9月9日）。

痲弦擔任《聯合報》副刊主編期間（1977-1997），偶爾也會以電話問候老作家，但龍瑛宗自認拙於言辭，為了避免講中文之累，曾直接以「沒有好消息奉告」急忙掛電話。事後自覺不安，只好以撰寫〈清代的祖先們〉⁶³一文回覆他的問候之意。除此之外，痲弦主編也會主動寫信向他邀稿：

明年報紙加張，版大了，盼先生多寫些小說，交我刊發。（1987年11月14日）

⁶¹ 1982年7月2日（紅毛城收回國有的第三天）座談的活動記載於《寶刀集》的附錄二〈永不熄滅的燭火：光復前台灣文學中民族意識與抗日精神座談會〉（1981年10月），頁251-268。

⁶² 龍瑛宗，〈一個望鄉族的告白——我的寫作生活〉，《聯合報》，1982年12月16日，第8版。

⁶³ 龍瑛宗，〈清代的祖先們〉，《聯合報》，1991年9月3日，第25版。

聯副新闢「散文的創造·各家聯展」專欄，推出以來各界反應熱烈，讀者極多。為使此一專欄更上層樓，很盼望您能支持一篇，感性散文形式，內容寫什麼都可以，文長以不超過一千字為宜，大作盼能在七月十二日以前賜下。

報紙近來改版之風甚熾，娛樂取向掛帥，爭奇鬥艷，好不熱鬧，聯副將不受流行、時尚影響，堅持文學副刊路線，不過一定得有一番新的表現才行。這短短的一千字長度的散文聯展，有台灣文壇群策群力維護文學副刊的象徵意義，務請「寶刀集」老友拔刀相助。⁶⁴

但，龍瑛宗卻寄送〈於嘉峪關〉一作，故痙弦回覆：

〈於嘉峪關〉收到，不久刊出，請勿念。照片用不上，敬還。

如有其他新作，也盼交聯副發表。謝謝。

〈於嘉峪關〉嫌短不放在專欄單獨發表。請另外寫篇一千字的散文如何？請於七月底以前賜下。⁶⁵

最後，他並未如期繳交出散文，痙弦雖然積極向龍瑛宗邀稿，但並未全數刊出，1984年甚至多次被聯副退稿⁶⁶，但他仍努力不懈地書寫稿投寄稿件。

龍瑛宗很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是同時代的日語作家中仍繼續堅持創作的人，即便使用不甚流利的「中文」，他亦奮力不斷地寫，對文學書寫的執念之深，或許也感動聯副主編痙弦，不吝提供篇幅供他發表，鼓勵他繼續寫作。聯合報社為此還特地頒給與他的〈勁風與野草〉特別獎和獎金，在家書中他也興奮地與文甫分享獲獎喜悅：「夏天時，我投稿於「聯合報文學獎」的中長篇小說，在諸多作品中脫穎而出。〈勁風與野草〉獲選為聯合報特別獎，獎金八萬元。（1982

⁶⁴ 痙弦致龍瑛宗書簡，書信日期：1992年6月18日。

⁶⁵ 痙弦致龍瑛宗書簡，書信日期：1992年。

⁶⁶ 聯副致龍瑛宗書簡，書信日期：1984年4月12日。內容如下：「龍瑛宗先生尊鑑：承蒙您賜稿，至謝。尊作『農婦與日兵』、『鄆成故事』兩篇，聯副決定借重，『小小的支那人』不太合適，僅原壁奉還，並祈見諒。專此順頌 撰祺 聯副敬上 73年4月12日。」（聯合報社用箋）書信日期：1984年4月21日。內容如下：「劉先生尊鑑：承蒙您源源賜稿，至謝。尊作『夕陽與牧童』這篇不太合適，未能借重，謹請見諒。專此順頌 撰祺 聯副敬上 73年4月21日。」

年 10 月 8 日)」在省內、外作家涇渭分明的年代裡，一位戰前的跨語本省籍作家和外省籍主編，因為對「文學」的熱愛讓他們得以跨越族群、語言建立一段難得的情誼。

四、結語

同樣的歷史在龍瑛宗的生命似乎重演了兩次，戰前獲獎後心想到帝都一圓文學夢，但經濟現實的包袱太重，只能作罷。戰後退休後亟欲重返文壇，想以日語書寫，但已見力不從心，唯一的長篇小說《紅塵》的出版過程也一再受挫，在日可刊登出版之處甚為有限。因此，他只好轉回島內，以戰後才重新習得的「中文」慢慢揣摩撰寫成文，若無深刻的文學靈魂和堅毅的精神，豈能翻閱語言的高牆，面對稿件無處可投，一再被退稿的挫敗。

從龍瑛宗收藏的書簡和家書，可以了解他在規律的日常生活中鍛鍊自己的心志。家書中以「日文」書寫有關親友往來閒談、海外旅遊見聞一一成為他晚年的「中文」寫作題材。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深受日本教養主義的影響，執著於知性的追求，從書信中亦可窺見他一生堅持閱讀的習慣，在生活日常他也藉由觀賞畫展培養自己的美學涵養。七〇年代末龍瑛宗重返文壇，除了因他個人的因素之外，台灣政經社會的轉型，也提供他諸多客觀的條件，讓沉寂三十多年的日語作家有機會重新出土。川端康成等人的訪台，因緣際會幾位戰前的日語作家備受鼓舞重。

龍瑛宗由於長子劉文甫留學日本，讓他主動重建與戰前的日本友人的人際網絡。綜觀戰後他主要聯繫的日人文友社群有二：一是戰前《文藝台灣》的同人們，例如：北原政吉、西川滿、小石原妙子等人；另一群是經吳濁流輾轉介紹重新連絡上的，例如池田敏雄、工藤好美等人。雖然這群日本友人曾試圖協助他，但幾經挫折後讓他體認到重返日本文壇已不可能，轉而計劃性地積極以中文創作。

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後，台灣社會更積極地重新認識光復前臺灣本土作家，之後，國內外學者紛沓而至訪談和索取資料，促使他開始整理自己戰前的文稿、

書信等。八〇年代後報紙副刊主編紛紛向「前輩作家」邀稿，龍瑛宗積極回應這得來不易的發表機會努力撰稿，其中跨越族群、語言與痠弦建立一段難得的作家與主編的友誼。

晚年的文章中回憶隨筆總多於小說創作，雜談內容居多，戰後文學的成就顯然不及戰前積累的高度，他自嘲是〈一個老頭兒的獨言細語〉⁶⁷，但其中卻隱藏著他身為「台灣前輩作家」、「客籍作家」的歷史使命感，反覆書寫北埔客籍家族墾拓的歷史經驗史和殖民地經驗的記憶、北埔的地方知識等，試圖重建台灣歷史記憶和主體性，積累台灣後殖民文學的文本。龍瑛宗戰後復出文壇應是為了追尋文學的永恆，一圓成為文學家的夢想。雖然他終其一生只能用借來的語言書寫，以一生的文學經歷見證了身為殖民地作家的悲哀。然而，他書寫實踐的本身即是吟詠日語世代絕望的悲歌，書寫的意志即是身為絕望者「希望」的形式。

⁶⁷ 龍瑛宗，〈一個老頭兒的獨言細語〉，《龍瑛宗全集·隨筆集（2）》，頁 235-237。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下村作次郎，《文学で読む台湾》（東京：田畑書店，1994年）。
- 下村作次郎編，《台灣長篇小說集》（東京：綠蔭書房，2002年）。
- 王惠珍編，《戰鼓聲中的歌者：龍瑛宗及其同時東亞作家論文集》（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11年）。
- 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小事典》（東京：綠蔭書房，2005年）。
- 北原政吉，〈龍瑛宗氏について〉，《だぁひん》第5號（1979年5月），頁21。
- 金光林，〈中日韓現代詩人會議文獻〉，《笠》第107期（1982年2月），頁59-61。
- 周芬伶，《龍瑛宗傳》（台北：聯經出版社，2015年）。
- 張默，〈中國現代詩壇卅年大事記〉，《中外文學》10卷12期（1982年5月），頁258-259。
- 陳萬益主編，《龍瑛宗全集》（台南：國家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
- 彭瑞金主編，《鍾肇政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前衛，2018年）。
- 黃武忠，《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作家小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1980年）。
- 黃得時，《張文環先生追思錄》（非賣品，1978年）。
- 聯合報編輯部，《寶刀集》（台北：聯經，1981年）。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 王惠珍，〈後解嚴時期西川滿文學翻譯的文化政治〉，《台灣文學學報》第29期（2016年12月），頁79-100。
- 王藍，〈國際筆會與文化交流〉，《東方雜誌》4卷4至6號（1970年10-12月），頁61-67、70-77、57-74。

- 李敏勇，〈在夜暗中幽微的月——紀念龍瑛宗〉，《淡水牛津文藝》第 6 期（2000 年 6 月）頁 83-84。
- 吳濁流，〈川端康成先生演講的弦外之音〉，《台灣文藝》7 卷 29 期（1970 年 10 月），頁 3-5。
- 岡崎郁子著，戴嘉玲譯，〈戰後台灣的日文文藝研究——以黃靈芝為中心 11〉，《台灣文學評論》4 卷 1 期（2004 年 1 月），頁 154-168。
- 塚本照和著，張桂娥譯，〈追憶王昶雄先生〉，《淡水牛津文藝》第 8 期（2000 年 7 月），頁 56-58。
- 劉知甫，〈憶父親的文學魂〉，《淡水牛津文藝》第 6 期（2000 年 1 月），頁 94-101。
- 劉文甫，〈同時代的兩位作家——龍瑛宗與西川滿〉，《新竹文獻》第 49 期（2012 年 6 月），頁 7-12。
- 龍瑛宗，〈《文藝台灣》と《台灣文藝》〉，《台灣近代現代史研究》第 3 期（1981 年 1 月），頁 86-89。
- 龍瑛宗，〈幾山河を越えて〉，《啞啞》第 24、25 期合併號（1989 年 7 月），頁 12-13。
- 龍瑛宗，〈給文友的七封信〉，《台灣文藝》第 87 期（1984 年 3 月），頁 169-180。

（二）碩博士論文

- 許維育，《戰後龍瑛宗及其文學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8 年 6 月）。
- 陳采琪，《跨時代的「皇民文學」作家——陳火泉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年 7 月）。

三、報紙文章

- 不著撰者，〈秦時明月〉，《中國時報》，1970 年 6 月 27 日，第 3 版。
- 不著撰者，〈亞洲作家代表昨暢遊日月潭〉，《中國時報》，1970 年 6 月 22 日，第 6 版。

龍瑛宗，〈一個望鄉族的告白——我的寫作生活〉，《聯合報》，1982年12月16日，第8版。

龍瑛宗，〈清代的祖先們〉，《聯合報》，1991年9月3日，第25版。

四、網路資料

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國際筆會第三屆亞洲作家會議〉，（來源：<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31/a6/73.html>，2018年5月16日）。

五、其他

劉文甫，〈龍瑛宗の戦後の日本訪問について〉，未刊稿。

